

编者序

阿萨·乌尔·伊克巴尔·拉迪夫

(Asad-Ul Iqbal Latif)

■ 学者型政治家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 Carr)曾痛下针砭，从来没人在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中生活过，以此警告世人不可沉醉于乌托邦的浪漫幻想。其实，无论威权柏拉图主义、莫尔笔下乌托邦的共产人道主义、马列主义的无阶级无国家绝对主义，或儒家秩序强调的等级家庭和谐，都从未有人亲身体验，而且永远不会有。世上没有绝对的乌托邦，也不可能绝对的乌托邦：政治举措和制度一旦践行乌托邦原则，“完美”的虚幻魅力，就会消失在现实中。

但是，建国理念和初衷若不立足于追求人间完美，国家便毫无意义。恰因乌托邦无法成真，才要将之奉为圭臬指导行为。这是政治思想家面临的一大讽刺。政客和哲人政治家成为讽刺对象，是因他们不同于单纯的思想家；他们必须管理国家，从而达到某些目标。

杨荣文是学者、军人、哲学家、政治家、天主教徒、太极习练者、爱护家庭的男人以及脸上挂着价值百万灿烂笑容的人（而且不含消费税！），并且竭力解决本书所述的基本问题。杨荣文生于1954年9月13日，因成绩优异而获得总统奖学金和新加坡武装部队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攻读工程学，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后到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毕业时获“贝克学者”荣衔。

在军中，杨荣文一路晋升至新加坡空军部队准将。他曾担任空军参谋长和国防部三军行动与策划处处长。1988年大选，杨荣文以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身份步入政坛。此后在内阁任职，先后掌管新闻及艺术部、卫生部、贸易与工业部及外交部。2011年大选，杨荣文失去国会议席。

新加坡技术官员治国，其中坚力量是工程师。而杨荣文在其政治生涯中，颠覆了众人对于工程师这股治国中坚力量的刻板印象——但也只是刻板印象。本书选录的文章显示，杨荣文的政治领袖使命感洋溢着深思远虑。这在领袖当中虽然常见，但杨荣文有生发于学术前沿的敏锐洞察力和果断行动力；学术前沿还生发对良政之重要定义和方向的孜孜探索，有些答案或已寻获：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责任、市场力量与社会公平、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等各种辩证博弈。有条主线贯穿这一双双对立体，道德是牵引之线：目的与手段在政治行为中相对立。

杨荣文很快便展现他的思维结构异于较传统的领袖。他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演说，其间讲到修剪新加坡的榕树。他把榕树比作在其之下寸草难生的政治天幕，昭示了公民社会运动时代将到来。要知道，当时还有人以为公民社会威胁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地位。今天，这篇演说似乎不算惊世骇俗，但彼时引起极大关注，是因正值以李光耀总理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与以吴作栋总理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权力交接，新的政治前景和期待正酝酿翻腾。杨荣文为第三代领袖，第二代领袖刚接管政权，他就已有此远见。

我们或许可以视杨荣文为自由保守主义派。他是新加坡精英但威权体制下的典型产物，是政治保守派，相信新加坡自然资源匮乏，不容丝毫差错；既是城邦，一切以纪律和稳定为重。但他高瞻远瞩，知道维持秩序和稳定的不二法则，是审慎适度、自内放开体制，以鼓励崇尚自由的年轻公民追求理想、保持活力。

文化

文化在杨荣文知识版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认为文化是形塑人类行为亘古不变的源泉，这一观点在他的相关演说中清晰可见。当然，并非文化本身古今一辙：相反，文化能存在，恰因其不惮改变、敞怀纳容，失恒之后，在改变和加速之间找寻另一平衡点。但因为文化如此生息变化，所以文化是人类理解现实并谋求改变现实的内在本质。

有些人认为，自治和民主是任何政治社会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他们对杨荣文从“文化视角”解读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也许感到失望。但如杨荣文所言，尽管民主转型是有实证数据可鉴的历史潮流，但转型的形式、时间、方式和结果，均源自国家的文化结构。无论如何，同样合法的民主体制，其制度也可能相去甚远。总统制度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美国总统制度的民主合法性，非但不同于欧洲议会制度，也不同于法国的总统制度。此外，得票多者即当选的选举制度也广泛认为合法，尽管比例代表制因为更具代表性而理应更民主，而代表性正是民主的归宿。鉴于这些制度都存在，新加坡特色民主制度的理念应该不难论证。杨荣文以睿智吐诚并严密论证此说，令人肃然起敬。民族文化确实对政治体制的形态和效果影响重大。

杨荣文有敏锐的文化洞察力，所以了解中国。中国文明路径多元，儒家、法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杨荣文对中国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展现了一大优点：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多面性有理智的警觉。在本书中，看不到针对中国的两大主流观点：一是中国曾经饱受屈辱，所以只要有理便可为所欲为，算清历史旧账；二是中国是东方暴政的典型，“自由”世界决不可任由中国自行其事。杨荣文没有简单采用历史二分法，而是剖析了中国复杂现代性的微妙之处，细致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在当代世界，中国逐渐茁壮成长，其它诸如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则相对逊色。杨荣文同样给予这些国际行为主体公正评价，评价

也同样从文化视角出发。他曾率团与美国、日本、澳洲和其它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由此深切体会自身利益在国际政治中为至关重要。然而，他始终不断挖掘自身利益在各国自我文化形象中的深层根源。因为自我文化形象是确立自身长期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基础。一国与他国交往，必然奉行实用主义。但首先，判断实用与否，终究来自其文化范畴中的各种可能。

本书汇集了杨荣文从政前后撰写并发表的全系列演说，包括至今还能引起共鸣的内政事务，以及关系新加坡生存和繁荣的东南亚、东北亚和美国的国际形势。

■ 政治与传媒

除了杨荣文政治遗产的核心——关于修剪威权主义榕树的隐喻，民主在本书有关政治与媒体的章节中也占据相当份额。杨荣文坦言，民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民主不仅是一人一票制，其核心“是一种认可个人优秀品质的价值体系”。的确，他指出，若无“大量智者自由合力”，现代文明就不会生根发芽。

有人会质疑杨荣文，为何提出传统亚洲价值观需要平衡“分化集体的自由市场力量”的论断，同样也会有人质疑他为何主张集中决策有助益；但杨荣文无疑接受并乐见民主对实现良政的支撑作用。不过，他强调民主有各种类型。他以独到的方式，说明民主“不是政治组织下的一个‘种’，而是一个‘属’，其内包含许多互相竞争的种”——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莫不如是。

因为相信民主，杨荣文自然深信制度重要。“好制度比个人更持久。”他说，“制度完善，就算运气欠佳、领导无能，国家也会安然无恙”。鉴于新加坡独立早期，领袖个人魅力是政治活动的重心，这种说法相当大胆。他还直截了当说：“我们要的不是再找一个李光耀，而是强大的制度”。人类本能在形成和维持政治制度时，有其作用，也有其局限。杨荣文评论文化DNA和自由时洞悉入微，阐明了他对人类本能的理解。

在杨荣文看来，强干的领导层和政治共识，对善治的作用无以伦比。解读他这观点，要以上述背景为依托。他谈及行政部门的作用时，显示其政治家的洞察力；尽管他是一流思想家，但也明白官僚机制是变理想为观点、变政治为政策的要素。

远在这些问题变成偏颇的政治议题之前，杨荣文就表示增长要关照公平，并提出了一个能永远立足的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随着新加坡走向全球化，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维护公平。此外，杨荣文还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灵敏、永续的人权框架。

杨荣文对传媒的评价，既有对世界一大文化现象的哲学理解，又有对改变传媒格局的技术的科学好奇。